

海外利益专题

社区干扰、外国干预与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的安全风险^{*}

宋亦明 戴璐璟

内容提要：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国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正迅速凸显，如何识别海外安全风险、保障海外安全利益业已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拉美国家因其优渥的资源禀赋吸引着中国的投资，但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又潜藏着严峻的投资安全风险。为了揭示中国在拉美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的来源，本文尝试与关于资源类对外投资安全的既有研究进行对话，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对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圭亚那等国家资源投资的案例考察，检视政府效能、腐败程度、民众参与等诸多因素对投资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由环境保护、劳工保障和居民安置等方面问题激发的社区干扰以及来自域外大国及邻国的第三方干预已经成为中国在拉美资源领域投资中不容忽视的风险。基于此，相较于从国有化政策、国家脆弱性、民粹主义风潮等国家层面理解海外安全风险的成熟研究，本文分别在地方层面和超国家层面进一步凸显了社区干扰和外国干预两个因素对分析中国在拉美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的价值。

关键词：海外安全 政治风险 资源投资 社区干扰 外国干预

作者简介：宋亦明，法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戴璐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4) 04-0049-28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一带一路’资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政治风险研究”（编号：2023ZX026）的阶段性成果。王飞、安雨康接受了学术访谈，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文文责由笔者自负。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规模逐渐提升，经济活动的跨国影响也在不断显现。这不仅意味着政府需要在复杂的跨国经济活动中实现有效的监管，更要求国家能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捍卫自身经济安全。为了同时实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目标，国家需要在两种情境下平衡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①：其一，在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要素进入本国的情境下保障国家安全；其二，在本国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要素进入他国的情境下捍卫国家安全。就前者而言，经济活动与要素的在地性（locality）以及政府在领土内采取行动的有效性都有助于降低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就后者而言，主权原则限制了政府在其他国家领土采取行动的合法性，而跨国投送能力不足同样约束了政府在其他国家领土采取行动的有效性，这些在客观上都明显提高了维护海外安全的难度。正因如此，识别海外安全风险、保护海外安全利益正变得愈加重要和急迫。

资本是主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跨国流动也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类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中，本国的土地不具有跨国流动性因而无涉海外安全议题。^② 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是近年来世界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也是各国海外安全保护的重中之重。^③ 资本的跨国流动同样是塑造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按照流动性和流动形式，资本的跨国流动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在另一国通过并购既有企业或建立新企业的方式进行实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一过程周期较长且往往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对外间接投资则借助于股票、证券等金融工具对另一国的企业进行非生产性投资，这一过程周期较短且稳定性往往较差。即便仅聚焦于对外直接投资，2022年全球范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维持在约1.3万亿美元的水平上。^④ 其中，针对可再生能源、金属矿产和资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增长意义重大，这些投资的安全性尤其值得关注。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② 本文关于三类生产要素的讨论主要借鉴了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的研究，参见[美]罗纳德·罗戈夫斯基著，杨毅译：《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③ 夏莉萍：《海外中国公民安全风险与保护》，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16页；汪段泳：《中国海外公民安全：基于对外交部“出国特别提醒”（2008—2010）的量化解读》，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第60-75页。

^④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3: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 2023.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investment-report-2023>. [2024-06-08]

拉美国家因其优渥的资源禀赋吸引着可观的投资规模，也是中国企业海外资源类投资的重要目标地区。拉美国家在 2022 年吸纳的直接投资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 2080 亿美元，同期绿地投资项目数量也增至 1409 个的历史最高水平。^① 投资规模与项目数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世界其他国家对于拉美资源的青睐。其中，中国 2022 年在拉美国家投资的流量为 44 亿美元，2013—2022 年间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存量更是高达 1220 亿美元。^② 分领域看，中国在拉美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锂、铜、石油等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可以说，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产业的投资存量规模巨大。这些投资为相关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提高了中国在战略性矿产和能源产业链上的影响力。但同时，拉美国家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也提高了这些投资所面临的安全风险，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在不同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的安全风险情况如何？哪些因素及其组合会威胁中国资源类投资的安全？这些因素在具体的投资项目中如何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部分回顾关于资源类对外投资安全的既有研究，从“彼学”“己学”和“关系学”的视角出发呈现了该领域的学术谱系及未尽之处；第二部分借助定性比较分析（QCA）检视可能有损于中国对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的诸多因素，探讨了可能的因素及其组合；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聚焦于社区干扰与外国干预这两个因素，通过中国在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投资项目案例分析展现这两个因素的重要负面影响；第五部分是结论。

一 对外资源投资的安全学：三个研究视角

作为横跨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重要议题，对外投资风险研究的焦点在于探讨风险类别、风险成因以及风险管控。面对东道国与母国各自潜存的资源投资风险，相关研究分别在“彼学”与“己学”的范畴内加以讨论。^③

^①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3: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 2023.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investment-report-2023>. [2024-06-08]

^② Zara C. Albright, et al., “China-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Bulletin (2023 Edition)”, 2023. <https://www.bu.edu/gdp/files/2023/04>. [2024-06-08]

^③ 关于“彼学”与“己学”的探讨，参见任晓著：《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409页。

此外，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第三国干预也影响着对外投资的风险大小，因而诸多研究也在“关系学”的范畴内探讨对外资源投资的风险问题。由此，下面以“彼学”“己学”和“关系学”为脉络，呈现资源投资安全的学术谱系及其未尽之处。

（一）“彼学”范畴内的对外资源投资风险研究

针对东道国的资源投资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政体类型、产权制度、政治暴力和国有化4个领域。

首先，东道国的威权政体可能大幅提高资源投资风险。传统的“民主—威权”二分法研究普遍认为投资风险与政体的威权程度呈正相关：民主政体可以通过约束政策的实施、提高回应性等机制降低投资风险；相较而言，威权政体下由于缺乏政策约束、回应性较低等原因而使得投资风险上升。^① 这些将政体二分为民主与威权类型的研究过于粗糙，而对于威权程度与投资风险线性关系的讨论也较为简化。因此，近年来以奥克桑·巴尤尔根（Oksan Bayulgen）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打破这种线性讨论的固有印象。她研究阿塞拜疆、俄罗斯和挪威的石油投资后发现，威权程度与投资风险呈现出“倒U型”关系，威权政体下的投资风险并不高，反倒是在民主与威权混合政体下的投资风险最高。^②

其次，产权界定模糊、产权保护不足以及监管能力低下等因素会增加资源投资风险。一方面，如同主流制度经济学所释产权保护有助于经济增长的逻辑，强有力的法律体系、受约束的政府行为等能够减少海外投资者对东道国资源类投资风险的担忧。^③ 而当产权界定模糊或产权保护不足时，投资者将

^① Philipp Harms and Heinrich W. Ursprung, “Do Civil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Really Boos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conomic Inquiry*, Vol. 40, No. 4, 2002, pp. 651 – 663; Nathan Jensen, “Political Risk,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0, No. 4, 2008, pp. 1040 – 1052; Douglass C.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 – Century England”,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4, 1989, pp. 803 – 832.

^② Oksan Bayulge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egimes: The Oil Sector in Azerbaijan, Russia, and Norw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 – 6; John R. Oneal, “The Affinity of Foreign Investors for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7, No. 3, 1994, pp. 565 – 588; 陈兆源：《东道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0—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129 – 156页。

^③ Henning Bohn and Robert T. Deacon, “Ownership Risk, Investment, and th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No. 3, 2000, pp. 526 – 549; Quan Li, “Democracy, Autocracy, and Expropri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2, No. 8, 2009, pp. 1098 – 1127; Kazunobu Hayakawa, et al., “How does Country Risk Matter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51, No. 1, 2013, pp. 60 – 78.

面临较大的风险。另一方面，监管制度的缺失或执行不力会提高投资风险。实际上，官僚问责制的建立、大力惩治腐败、健全招投标体系等都有助于提供有关公共决策的透明信息，进而能够降低投资风险。这些因素对于资源这类经常出现寡头垄断甚至自然垄断的产业来说更是意义重大。可以说东道国的信息透明度与资源投资风险呈负相关，而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制度的建立与健全。^①

再次，政治暴力也是关乎资源投资风险的关键变量，诸如内战、恐怖袭击、社会冲突等政治暴力会通过破坏政治稳定性来增加资源投资风险。政治暴力在资源领域的直接后果主要表现为管道破坏、油田焚毁、矿山废弃，或表现为资源投资项目的风险溢价增加。^② 作为烈度最高的政治暴力，内战、国家间战争与恐怖袭击将大幅提高资源投资的风险。^③ 而作为烈度较低的政治暴力，暴力示威及罢工等同样能够对资源投资造成威胁。值得一提的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民众针对资源投资项目宣泄不满的重要导火索。特别是由此引发的搬迁、赔偿问题很容易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接踵而至的不合常理的高额索赔已经成为资源投资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④

最后，以国有化政策为代表的资源民族主义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投资风险。^⑤ 资源民族主义的主要表征不仅拘泥于国有化运动，还包括以政府为主的

^① Hong Chen, et al., “What Motivates Chi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to Invest in Asia? Poor Institutions versus Rich Infrastructures of a Host Country”, i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89, 2022, pp. 1 – 10; Mumtaz H. Shah and Anum G. Afridi, “Significance of Good Governance for FDI Inflows in SAARC Countries”,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view*, Vol. 7, No. 2, 2015, pp. 31 – 52; 付韶军:《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对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59 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18 年第 1 期,第 70 – 78 页;刘洁、郭剑鸣、刘相锋:《反腐败、能源投资和能源效率》,载《财经论丛》,2022 年第 12 期,第 103 – 112 页。

^② John N. Kallianioti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Exchange Rates: Trade, Investment, and Pari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82; 王妍娉:《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分析》,载《国际经济合作》,2006 年第 12 期,第 12 – 14 页。

^③ 唐世平、熊易寒、李辉:《石油是否导致族群战争?——过程追踪法与定量研究法的比较》,载《世界政治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54 – 87 页; Jeff D. Colgan, “Oil and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 Fuel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4, 2010, pp. 661 – 694; Chia – yi Lee, “Oil and Terrorism: Uncovering the Mechanisms”, 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2, No. 5, 2018, pp. 903 – 928.

^④ 梅新育:《更多政治暴力风险——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的发展趋势》,载《国际贸易》,2004 年第 10 期,第 9 – 13 页; Tom Ogwang, et al., “Rent-Seeking Practices, Local Resource Curse, and Social Conflict in Uganda’s Emerging Oil Economy”, in *Land*, Vol. 8, No. 4, 2019, p. 53.

^⑤ Paul A. Haslam and Pablo Heidrich, et al.(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From Neoliberalism to Resource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2.

所有权结构和针对外国公司的强监管措施。^① 薛庆和王震着重研究了石油国有化决策的内在机制，认为油价冲击和资源国的民主化程度对国有化概率有显著影响。^② 自然资源租金的增加导致政治领导人征用和违约的动机增加，政治风险水平也高得多。^③ 总结而言，“彼学”范畴内的研究主要从政体类型、产权与监管、政治暴力与资源民族主义等不同视角阐释了东道国国内潜存的资源投资风险。

（二）“己学”范畴内的对外资源投资风险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与母国相关的因素也会影响对外资源投资的风险。例如，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与界定影响国家对外国投资的态度，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投资面临较大风险。斯蒂芬·克拉斯纳将国家利益定义为中央决策者所追求的一套一致的目标，国内领导人偏好、国家经济问题、国家利益集团的干预塑造着国家对外政策。特别是当领导人将军事力量所依赖的资源视为国家利益时，就会通过各种手段来保障资源供应、协助本国企业对抗东道国国有化政策。^④ 在关于国家安全的讨论中，主权国家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对特定产业的外国投资设置限制等方式来解决其国家安全的范畴框定问题。^⑤ 实际上，各国已经从非自我判断的安全条款转向采用自我判断的安全条款，以保护其监管主权和安全利益。^⑥

再如，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投资，由母国国有企业牵头的投资及以资源为标的的投资往往会面临更大风险。一方面，国有企业虽然有较高抗风险能力，

① Ekim Arbatli, “Resource Nationalism Revisited: A New Conceptualization in Light of Changing Actors and Strategies in the Oil Industry”, in *Energy Research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0, 2018, pp. 101–108; 王慧芝:《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及应对》,载《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年第3期,第25–35页。

② 薛庆、王震:《油价冲击、政治制度与资源国有化决策——基于1960—201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93–106页。

③ Nathan M. Jensen and Noel P. Johnston, “Political Risk, Reputation, and the Resource Curse”,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6, 2011, pp. 662–688; Riitta–Ilona Koivumäki, “Evading the Constraints of Globalization: Oil and Gas Nationalization in Venezuela and Bolivia”,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8, No. 1, 2015, p. 119.

④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8–39, pp. 330–353.

⑤ Frédéric Wehrlé and Joachim Pohli, “Investment Policies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A Survey of Country Practices”, June 14, 2016.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 [2024–06–08]

⑥ Ji Ma,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in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52, No. 4, 2019, pp. 899–947.

但往往因其具有的国家产权属性而被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抵制、阻拦或否决。^① 例如，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阻案已经充分表明，资源企业的国家色彩很容易引发猜忌和干扰。^② 另一方面，与轻工业等相比，资源产业投资的风险更大，这不仅是因为资源开发需要开展获取敏感信息的地质调查，更因为资源项目及其配套的基建项目很可能成为左右一国经济命脉的重要设施。因此，母国以资源为标的的投资必将遭受更严苛的审查，甚至在投资项目签署后也可能被勒令终止。^③ 总之，回顾“己学”背景下的对外投资风险研究，不难发现触及国家根本利益的投资、由国有企业牵头的投资以及资源类投资往往会面临更高的风险。

（三）“关系学”范畴内的对外资源投资风险研究

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第三国与母国及东道国的三边关系中都潜藏着资源投资安全风险。

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对投资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消极的双边政治经济关系下资源投资风险较大。^④ 良好的双边政治经济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克服东道国制度不完善的不利影响、减弱投资经营的不确定性、使得两国次国家行为体的沟通更为畅通，因而相关分歧与纠纷也较容易通过官方协商解决。^⑤ 而在两国交恶、双方政治经济关系较差的背景下，东道国政府可能会抵制母国资源投资或对相关投资企业施加政治性干预。^⑥ 20

① 陈兆源、李晨阳：《对外投资合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6期，第18-39页；Jing-Lin Duanmu, “State-Owned MNCs and Host Country Expropriation Risk: The Role of Home State Soft Power and Economic Gunboat Diplomacy”,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45, No. 5, 2014, pp. 1044-1060.

② 崔守军：《中国能源国际合作模式的选择》，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1期，第33-38页。

③ 毛维准：《大国海外基建与地区秩序变动——以中国—东南亚基建合作为案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96-122页；陈涛涛等：《美国投资环境的表象及其根源——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启示》，载《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3期，第17-23页。

④ Douglas Nigh,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Events on United State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Pooled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6, No. 1, 1985, pp. 1-17; Quan Li and Tatiana Vashchilko, “Dyadic Military Conflict, Security Alliances, and Bilateral FDI Flows”,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41, No. 5, 2010, pp. 765-782.

⑤ 潘镇、金中坤：《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载《财贸经济》，2015年第6期，第85-97页；Jing-Lin Duanmu, “State-owned MNCs and Host Country Expropriation Risk: The Role of Home State Soft Power and Economic Gunboat Diplomacy”,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45, No. 5, 2014, pp. 1044-1060.

⑥ 刘军荣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与管理研究：基于世界经济波动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83-84页。

世纪70年代之前，国家间关系恶化所带来的资源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东道国政府没收母国企业的投资资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道国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严格管制、高税收等手段胁迫母国投资企业为不佳的双边关系买单。^①

第三国针对母国或东道国的干预同样增加了资源投资风险。例如，第三国对母国在东道国资源投资的妖魔化提高了其投资风险。部分西方国家从对外投资流向及对东道国影响的角度出发，污蔑中国的资源投资会导致“新殖民主义”^②。这些污蔑很容易在东道国激起民众的不满甚至敌意，东道国政府面对第三国干预和国内民众的情绪也往往选择违约，这些都提高了投资风险。再如，美国知识产权机制泛安全化、长臂管辖域外滥用、直接制裁等手段都不同程度地约束了其他国家的对外资源投资。^③此外，关于国内冲突的研究表明，第三国对东道国反对派政治势力及反对派武装的支持不仅会提高冲突的烈度，也会延长冲突的时间。^④无论是冲突烈度的提升还是冲突时间的延长，都在客观上提高了资源投资风险。

如果说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干预影响深远，那么邻国干预对资源投资风险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特别是，以内战传导、危机传染和政策扩散为表征的邻国干预都增加了资源投资风险。就内战传导而言，一国的其他邻国如果处于内战之中，会显著增加本国经历内战的风险^⑤；就危机传染而言，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表明，一个国家、市场和公司特有的风险可能迅速蔓延到另一个国家、市场和公司^⑥；就政策扩散而言，其特指一个国家的政策受到

① 张建红、姜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142页。

② 相关梳理参见门洪华、钟飞腾：《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68页；姜潇潇：《中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载《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6期，第31-34页。

③ 夏玮、吴昊天：《美国知识产权机制泛安全化的内容、影响及中国应对》，载《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第1-21页；张岳然等：《美国长臂管辖域外滥用与中国应对策略》，载《国际贸易》，2021年第3期，第36-43页。

④ Dylan Balch-Lindsay and Andrew J. Enterline, “Killing Time: The World Politics of Civil War Duration, 1820-1992”,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4, 2000, pp. 615-642; Patrick M. Rega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Intrastate Conflicts”, 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1, 2002, pp. 55-73.

⑤ Nicholas Sambanis, “Do Ethnic and Nonethnic Civil Wars Have the Same Caus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 (Part 1)”, 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3, 2001, pp. 259-282; Zaryab Iqbal and Harvey Starr, “Bad Neighbors: Failed Stat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5, No. 4, 2008, pp. 315-331.

⑥ Matteo Foglia, et al., “Bad or Good Neighbours: A Spatial Financial Contagion Study”, in *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37, No. 4, 2020, pp. 753-776.

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①，如一个国家的汽油消费税与其邻国的汽油消费税呈正相关，这种共变性在地理临近或语言相似的国家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②换句话说，邻国作为第三国所推行的政策也会对东道国产生影响，从而提高了母国资源投资的不确定性。

总结而言，既有研究在“彼学”“己学”和“关系学”的范畴内讨论了对外资源投资的风险类型及其形成原因，针对相关风险提出了对策建议，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资源投资的安全学议程。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两方面的未尽之处。一是对外资源投资风险研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果多因”问题，而回归分析和构建风险指标也各自面临着技术性挑战。就前者而言，不仅诸多可能诱发风险的变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而且投资风险本身也与诸多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构建风险指标存在指标的一般性与不同国家的特性之间的明显张力。二是多数研究囿于对资源投资风险的描述性罗列，这种罗列不仅无法阐明风险拖累投资的作用过程，也缺乏对相关案例的讨论和追踪。可以说，既有研究关于对外资源风险及其来源的讨论仍有进一步补充和提升的空间。

二 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的来源

为了尽可能避免上述两方面的未尽之处，在与既有研究对话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来检视可能有损于中国对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的诸多因素，探讨了可能的因素及其组合。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社区干扰与外国干预是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的重要来源。

（一）定性比较分析的适用性与数据来源

之所以需要使用定性比较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本文以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作为研究对象，其观察值数量多于个案研究的数量上限但低于回归分析的推荐下限。前者在研究中的对象观察值往往不超过10个，而后者被普遍用于100个以上样本及更高量级样本的研究中。^③正是为了

^① Fabrizio Gilardi and Fabio Wasserfallen, “The Politics of Policy Diffusion”,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8, No. 4, 2019, pp. 1245 – 1256.

^② Muzhou Zhang, “Policy Diffusion and the Interdependent Fuel Taxes”, in *Climatic Change*, Vol. 176, No. 12, 2023, pp. 1 – 8.

^③ Edward Evans-Pritchar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3, p. 22; Theda Skocpol and Margaret Somers, “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2, No. 2, 1980, pp. 174 – 197.

弥补回归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探讨观察值为 10 ~ 100 的中小规模样本上的薄弱之处，查尔斯·拉金等学者开发了定性比较分析并规范了其操作规程。^① 就此而言，定性比较分析刚好可以被用于针对中国在 33 个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的研究。其二，依托于集合论思维的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在技术层面回避关于条件变量交互效应和内生性问题的讨论。^② 定性比较分析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分析能够有效弥补回归分析识别变量间交互效应的短板。在回归分析中，将不同自变量的交互项纳入模型将得到大相径庭的结果，以至于其在分析多于 3 个自变量的交互效应时面临着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③ 而在定性比较分析中，特定条件变量被纳入分析后得到固定的吻合度（consistency）与覆盖度（coverage），两者不会因为新条件变量的引入而发生变化。弗雷德里克·范德普洛格等的研究表明，资源的开发并非仅取决于外生的地质因素，也受制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体开放性内生因素的影响。^④ 由此所产生的资源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在回归分析中较为棘手，但在定性比较分析中则可以被回避。

历经近 40 年的发展，定性比较分析已经发展出了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时序定性比较分析、时间序列定性比较分析等在内的多种子分析类型。考虑到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本质上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的延伸，加之本研究无需专门讨论各条件变量之间的时序和特定条件变量的前后变化，因此本文仅聚焦于清晰集分析和模糊集分析。^⑤ 相对而言，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就本研究而言具有更好的适用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别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将原始数据进行二分值的转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可以根据隶属度的差异将原始数据转

① Charles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Charles Ragin, *Fuzzy Sets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美] 查尔斯·C. 拉金著，杜运周等译：《重新设计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年。

② [美] 加里·格尔茨、[美] 詹姆斯·马奥尼著，刘军译：《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 年，第 19 - 27 页。

③ 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 and 任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5 期，第 52 页。

④ Rabah Arezki,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and Frederik Toscani, “The Shifting Natural Wealth of Nations: The Role of Market Orientation”, i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38, 2019, pp. 228 - 245.

⑤ 释启鹏：《时间中的定性比较分析：TQCA 与 TSQCA 的发展》，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40 - 58 页。

化为连续值，从而避免了由简单二分法所带来的过度简化、划分标准主观等诸多问题。^①

在参考资源类对外投资安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条件变量并尝试对其进行操作化处理。（1）公共政策的推进有赖于否决者（veto player）的同意，否则政策将无法得到批准和推进^②；否决者的数量对于投资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数量也可以被准确测量。^③（2）问责回应性、政府效能和腐败控制对于投资风险及其可控性具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GI）得到观察。^④（3）较高的国家能力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抑制冲突、提高治理绩效具有基础性作用，进而也间接地有助于减少投资风险。^⑤国家能力连同与之相关的少数民族占比、国家脆弱性、经济发展水平同样需要得到讨论。^⑥（4）资源国有化长期以来被视为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的重要政治风险^⑦，国有化政策的出台往往会对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严重威胁国家的海外投资安全。迈克尔·汤姆兹等关于“主权窃取”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国有化类型学的讨论，这也使得对国有化传统的统计成为可能。^⑧（5）域外大国的经济制裁以及邻国的干扰等都会影响投资决策和投资风险，这些第三方因素分别能够通过“全球制裁数据

① [比] 伯努瓦·里蒙克斯、[美] 查尔斯·拉金编著，杜运周、李永发等译：《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77-84页。关于二分法的诸多问题详见刘丰：《类型化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设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49-56页。

② George Tsebelis, *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9-37; 田野：《贸易自由化、国内否决者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55-62页。

③ Carlos Scartascini, Cesi Cruz, and Philip Keefer, “The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2020 (DPI2020)”. <http://dx.doi.org/10.18235/0003049>. [2024-06-01]

④ Daniel Kaufmann and Aart Kraay,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2023.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2024-06-01]

⑤ 唐世平等：《国家能力：走出理论荒野》，载《学术月刊》，2022年第11期，第69-72页。

⑥ Jonathan K. Hanson and Rachael Sigman, “Stata Capacity Dataset”, October 2021. http://www-personal.umich.edu/~jkhanson/state_capacity.html. [2024-06-01]; The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State Fragility Index and Matrix, Time-Series Data, 1995-2018”.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 [2024-06-01];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onstant 2015 US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2024-06-01]

⑦ 王慧芝：《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及应对》，载《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年第3期，第25-35页。

⑧ Michael Tomz and Mark L. J. Wright, “Sovereign Theft: Theory and Evidence about Sovereign Default and Expropriation”, in William Hogan and Federico Sturzenegger (eds.), *The Natural Resources Trap: Private Investment without Public Commitment*, Cambridge: MIT Press, 2010, pp. 69-110.

库”和陆地邻国数量实现操作化。^①（6）国内社团数量越多、有组织的民间力量越强大，由环境保护、劳工保障和居民安置等问题所激发的社区干扰往往越明显。因此，国内社团数量也被置入条件变量中。^②

本文的结果变量是中国资源投资风险。中国资源投资风险是一个复合变量，由两个变量交乘而得：其一为“中国全球投资追踪”项目所搜集的中国在拉美国家能源和资源类投资金额^③；其二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和中海安集团所发布的“世界各国（地区）综合安全评估和预测指数”^④。可以说，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的资金规模越大、特定国家层面的安全风险越高，中国的资源类投资风险也就越大。对中国资源投资风险这一变量的初步测算发现，中国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的资源类投资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在墨西哥、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圭亚那面临着中等程度的安全风险；在乌拉圭等其余拉美国家所面临的风险相对较低并可控。

（二）校准与条件关系分析

参照查尔斯·拉金等关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学理逻辑、操作步骤及具体要求的研究，本研究分3步进行模糊集分析。^⑤

1. 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calibration）。校准是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独有且至关重要的环节，其将原始数据根据隶属度的差别转化为从0~1的连续值。而校准又可以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其中更为普遍且适用于本研究的直接法是针对特定变量设置3个锚点，即“完全隶属”“不完全隶属”和“交叉点”的具体值。^⑥在充分考虑不同变量数据结构的基础上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相应的锚点详见表1。

① 赵明昊：《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美国因素”》，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7期，第53-55页；Gabriel Felbermayr, et al., “The 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 i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129, 2020, pp. 1-23; Aleksandra Kirilakha, et al., “The 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 (GSDB)”. <https://www.globalsanctionsdatabase.com>. [2024-06-01]

② World Associ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orldwide NGO Directory”. <https://www.wango.org>. [2024-06-01]

③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2024-06-01]

④ 陈岳、施忠华主编：《中国海外安全风险蓝皮书（2024）》，内部研究报告。

⑤ Charles Ragin, *Fuzzy Sets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⑥ [美]查尔斯·C.拉金著，杜运周等译：《重新设计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47-72页。

表 1 变量数据来源及其校准锚点

	变量名称	数据来源	锚点 (0.95; 0.5; 0.05)
结果变量	中国资源投资风险 - ind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海外安全风险蓝皮书 (2024)》	—
条件变量	否决者数量 - vet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2020)	100; 52; 10
	问责回应性 - acc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3.5; 2.7; 1.5
	政府效能 - gov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2.9; 2.2; 1.6
	腐败控制 - cor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3.0; 2.3; 1.5
	少数民族占比 - eth	Geographical Researchon War, Unified Platform	0.5; 0.24; 0.05
	国家能力 - cap	Stata Capacity Dataset	0.8; 0.47; 0.1
	国家脆弱性 - fra	State Fragility Index and Matrix	10; 6; 2
	经济发展水平 - gdp	世界银行	20000; 9937; 3500
	国有化传统 - nat	Michael Tomzand Mark L. J. Wright	—
	遭受美国制裁 - san	Global Sanctions Database	6.0; 3.7; 1.5
	陆地邻国数量 - nei	笔者自行整理	5; 2; 0
	国内社团数量 - ngo	Worldwide NGO Directory	100; 44; 1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 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在构建原始数值表并校准的基础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需要先后进行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组合分析。无论是必要条件分析还是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其衡量的标准都旨在吻合度与覆盖度，其中吻合度越高表明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越高，覆盖度越高则表明解释范围越广。在进行必要条件分析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不仅可以检视单一条件变量，还可以处理两个及更多条件变量的组合。^① 如表 2 所示，否决者数量多、政府效能低、腐败控制低、有国有化传统、国内社团数量多、遭受美国制裁多或陆地邻国数量多的吻合度超过了 0.9 的阈值，因而可以被视为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较高的必要条件。其中，国内社团数量多意味着社区干扰严重，遭受美国制裁多或陆地邻国数量多则意味着外国干预突出。显然，必要条件分析已经有效印证了社区干扰和外国干预是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较高的重要影响因素。

^① 常晓燕：《美国为何介入盟国国际危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112-113页。

表 2 中国资源类投资高安全风险的必要条件

条件变量	吻合度	覆盖度
否决者数量多 (vet)	0.997167	0.423529
否决者数量少 (~vet)	0.238212	0.114667
问责回应性高 (acc)	0.711866	0.349185
问责回应性低 (~acc)	0.756185	0.315972
政府效能高 (gov)	0.542902	0.288660
政府效能低 (~gov)	0.911299	0.357220
腐败控制高 (cor)	0.310230	0.222222
腐败控制低 (~cor)	0.966698	0.318431
少数民族占比高 (eth)	0.642618	0.301690
少数民族占比低 (~eth)	0.703556	0.305656
国家脆弱性高 (fra)	0.725716	0.331226
国家脆弱性低 (~fra)	0.639848	0.285538
经济发展水平高 (gdp)	0.509663	0.373225
经济发展水平低 (~gdp)	0.814353	0.265583
国有化传统 (nat)	0.999936	0.225625
无国有化传统 (~nat)	0.000000	nan
国内社团数量多 (ngo)	0.908529	0.445047
国内社团数量少 (~ngo)	0.371168	0.155272
遭受美国制裁多 (san)	0.576141	0.241299
遭受美国制裁少 (~san)	0.653698	0.319783
陆地邻国数量多 (nei)	0.999936	0.337383
陆地邻国数量少 (~nei)	0.293610	0.200000
遭受美国制裁多或陆地邻国数量多 (san + nei)	0.999936	0.277053
遭受美国制裁少或陆地邻国数量少 (~san + ~nei)	0.770034	0.28630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3. 进行充分条件组合分析。本文将上述条件变量纳入真值表，并且以 1 为案例频率阈值以及 0.7 为吻合度阈值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条件组合。布尔简化的标准分析提供了中间解、精简解和复杂解 3 种不同的条件组合。^① 本研究

^① QCA3.0 操作手册也建议研究人员使用中间解，参见 Charles Ragin, et al., “User’s Guide to Fuzzy - Set/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2017. <http://www.soecsci.uci.edu/~cragin/fsQCA/download/fsQCAManual.pdf>. [2024 - 06 - 12]

选用中间解，其所列出的 4 个条件组合及其典型案例详见表 3。这 4 个条件组合的解的覆盖度为 0.81 且解的吻合度为 0.74，这意味着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较高有 4 条主要的解释路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委内瑞拉为典型案例的第 1 条路径中包含了“外国干预”的条件变量，而以巴西、秘鲁和阿根廷为典型案例的第 2、第 3、第 4 条路径则都涵盖了“社区干扰”的条件变量。这再次印证了外国干预与社区干扰对于理解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的重要意义。

表 3 中国资源类投资高安全风险的充分条件组合（基于中间解）

案例频率阈值：1；吻合度阈值：0.7				
条件组合	粗覆盖度	净覆盖度	吻合度	典型案例
veto2* ~ acc2* ~ gov2* ~ eth2* ~ cap2* san2* nei2* ~ gdp2* ~ ngo2* nat	0.329619	0.177274	0.70000	委内瑞拉
veto2* acc2* ~ gov2* eth2* cap2* ~ san2* nei2* ~ gdp2* ngo2* nat	0.315769	0.130186	0.883721	巴西
veto2* ~ acc2* ~ gov2* eth2* cap2* san2* nei2* ~ gdp2* ngo2* nat	0.362858	0.168964	0.813665	秘鲁
veto2* acc2* gov2* ~ eth2* cap2* ~ san2* nei2* gdp2* ngo2* nat	0.285300	0.135725	0.725352	阿根廷
解的覆盖度：0.811583				
解的吻合度：0.74365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社区干扰与外国干预是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其他条件变量同样值得探讨。譬如，资源国有化不仅是拉美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表征，也是政府进行财富分配的常用手段。^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及 21 世纪初的两次全球范围的资源国有化浪潮中，几乎所有资源禀赋丰裕的拉美国家都出现了国有化。^②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以及在智利投资近 41 亿美元的中国企业天齐锂业陷入“被公私合营”的处境都表明，资源国有化是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高风险的必要条件。^③ 再如，否决者数量多而非否决者数量少带来了更高的投资安全风

① Paasha Mahdavi, “Why Do Leaders Nationalize the Oil Industry? The Politics of Resource Expropriation”, in *Energy Policy*, Vol. 75, 2014, pp. 228–243.

② 薛庆、王震：《油价冲击、政治制度与资源国有化决策——基于 1960—2010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9 期，第 93–106 页。

③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要参股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2024 年 6 月 3 日。
<https://news.windin.com/bulletin>. [2024-06-12]

险，这意味着否决者并非投资项目的保护者而更可能是投资风险的制造者。总之，中国海外安全风险研究绝非针对单个条件变量的讨论，而是触及诸多条件变量及其复杂的组合。

三 社区干扰与中国资源类投资安全

定性比较分析证实了社区干扰与外国干预对于理解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与劳工或环境问题紧密联系的社区干扰在厄瓜多尔和秘鲁这两个国家中尤为突出。下面考察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和秘鲁所遭受的社区干扰，以此评估社区干扰对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投资的负面效应。

（一）厄瓜多尔社区干扰对中国矿业投资的影响

厄瓜多尔拥有开发潜力巨大的石油、铜精矿和黄金等矿产资源，但中国对厄瓜多尔的资源投资长期面临较高的社区干扰风险。石油产业是厄瓜多尔第一大支柱产业，采矿业是该国第四大支柱产业。^①中国与厄瓜多尔自建交以来政治与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中国位列其能源与基础设施的第一大投资国。数据显示，中国从2005—2023年间对厄瓜多尔进行了120.3亿美元的资源投资，投资金额在拉美国家中仅次于巴西、秘鲁、阿根廷和智利之后而排名第五。^②但2018—2022年间中国对厄瓜多尔直接投资存量呈递减趋势，仅2022年一年就同比减少了11%。^③厄瓜多尔最重要的五个矿区里有三个是由中国公司投资和运营，但这些项目都遭遇到了社区干扰而陷入暂停甚至瘫痪的困境。^④

作为厄瓜多尔第一个大规模采矿项目的米拉多尔（Mirador）铜矿虽然拥有3020万吨的超高铜储量，但该项目却是社区干扰最为突出的项目之一。^⑤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厄瓜多尔（2023）》，2024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guiana.pdf>. [2024-06-03]

②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2024-06-01]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编：《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3年，第57页。

④ 宁卉：《厄瓜多尔：白河区的社群抗议和采取法律行动令中国公司投资的金矿暂停营运》，企业责任资源中心，2019年7月18日。<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 [2024-06-16]

⑤ 卢决定、张开明：《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铜达伊米尾矿库启用》，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8月25日。https://www.ceec.net.cn/art/2021/8/25/art_11019_2510808.html. [2024-06-16]；《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矿业的活动：以米拉多和圣卡洛斯—帕那萨采矿项目为例》，2018年1月。<https://media.business-humanrights.org/media/documents/files/documents>. [2024-06-16]

自 2010 年起，中国铜陵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 6.5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加拿大科里安特资源公司（Corrientes Resources）96% 的股份并组建了厄瓜多尔科里安特公司（Ecuacorrientes S. A.）来负责该项目的实际运营。该项目原计划于 2016 年投产，但其从规划伊始就遭到针对环境保护的强烈抵制。自当地政府与资源公司于 2012 年签订合同后，该项目所在的埃尔潘吉县（El Pangui）就立即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当地民众徒步数百公里至首都基多，要求中资公司从米拉多尔项目中退出，这在厄瓜多尔国内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① 由于米拉多尔铜矿位于孔多尔山脉生态区内，当地居民以多种理由极力反对该项目进展，譬如声称项目开工以来所倾倒的沉积物和废水污染了通达梅河（Tundayme）与瓦韦梅河（Wawayme）的水质以及沿岸村庄；项目施工对森林的砍伐破坏了生态环境；因施工导致的土地更改与搬迁加剧了农民和社区的不安全感；采矿项目入侵了边界线，等等。^② 受制于环境许可问题和当地社区的阻碍，矿区建设最终被迫停止。^③

同样，圣卡洛斯—帕那萨铜矿（San Carlos - Panantza）也面临较高的社区干扰风险。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和中国铁建合资组建的瓜多尔探矿公司（Explorcobres S. A.）于 2012 年取得了该铜矿的采矿特许经营权并开启了项目的建设与发展进程。该项目最初设计开发一个 3200 公顷的矿床，原计划每天加工 9 万吨铜，预计产量为 6.78 亿吨铜。^④ 然而，该项目也在特许经营权数量和采矿地役权上与当地居民出现了严重的纠纷，还发生了土著人权利以及劳工权利保障等问题，这些社区干扰使得该项目一度暂停。^⑤

此外，位于厄瓜多尔白河村（Río Blanco）的金矿开采项目也遭受了严重的社区干扰。该项目由中国香港庄胜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黄金集团

^① Colectivo de Geografía Crítica del Ecuador, “Informe sobre los Impactos Ambientales y Sociales del Proyecto Minero Mirador”, Julio 2019. <https://geografiacriticaecuado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Informe-final-Mirador.pdf>. [2024-06-16]

^② Comité de Derechos Económicos, Sociales y Culturales de la Organización de Naciones Unidas (ONU), “China: Derechos Humanos y Actividades Empresar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febrero de 2023. <https://cidha.org/wp-content/uploads/2023/03>. [2024-06-16]

^③ 《厄瓜多尔矿业发展面临两大障碍》，中国矿业网，2019 年 3 月 25 日。 <http://www.chinamin.org.cn>. [2024-06-16]

^④ Plan Verde, “Minería en Morona Santiago: La Corte Constitucional Sentó un Precedente sobre Consultar a los Pueblos Afectados”, 12 de diciembre del 2022. <https://www.planv.com.ec/historias/plan-verde>. [2024-06-16]

^⑤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矿业的的活动：以米拉多和圣卡洛斯—帕那萨采矿项目为例》，2018 年 1 月。 <https://media.business-humanrights.org/media/documents/files/documents>. [2024-06-16]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成立的厄瓜多尔黄金矿业公司（Ecuagoldmining）持有。^①该项目于 2018 年刚进入生产阶段后，同年 5 月就爆发了激烈的抵制采矿运动。当地民众就“事先协商”这一土著人民权利提出抗议。此外，由劳工问题与环境纠纷引发的社区干扰也此起彼伏。^②如工人反抗公司减少用人数量和工时导致其收入大幅下降、民众不允许在水源附近储存采矿炸药等，这些都对项目的开发造成了明显的干扰。白河村和附近其他村落中反对采矿的村民将厄瓜多尔矿业部和环境部告上省级法庭，致使该项目被迫停产。尽管黄金矿业公司就此上诉，但厄瓜多尔法院驳回了上诉并继续要求停止在白河矿区的开发活动。^③

社区干扰是中国在厄瓜多尔进行资源投资时面临的主要风险，而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问题又成为诱发干扰的导火索。厄瓜多尔宪法承认多元文化并注重环境保护，该国的制度设计同样重视原住民在国家政策制定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并指出原住民赋予了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④由这些权益问题引发的频繁的反矿产开发运动导致多个资源开发项目暂停，造成了数以亿计的投资损失。需要注意到，中国在厄瓜多尔资源投资所遭受的社区风险并非个案。除来自中国的资源企业以外，加拿大在厄瓜多尔的采矿公司，如索拉里斯资源公司（Solaris）的旗舰项目瓦林扎（Warintza）煤矿项目同样面临着类似问题而被评估为高风险项目。可以说，社区干扰已经成为对厄瓜多尔资源投资项目的严重障碍。^⑤

① El Colectivo sobre Financiamiento e Inversiones Chinas, Derechos Humanos y Ambiente (CICDHA), “Proyecto Minero Río Blanco”. <https://cicdha.org/proyectos/proyecto-minero-rio-blanco/>. [2024-06-16]

② 关于“事先协商”的说明可参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19 条规定：各国在通过和实行可能影响到土著人民的立法或行政措施前，应本着诚意，通过土著人民自己的代表机构，与有关的土著人民协商和合作，并事先征得他们的自由知情同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2008 年。<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 [2024-07-03]

③ Alexandra Valencia, “Exclusive: Chinese Consortium Ecuagoldmining Opens Dispute with Ecuador over Halted Mine”, Reuters, February 19,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cuador-mining>. [2024-06-16]; Ning Hui, “Ecuador: Local Protests and Legal Action Put Operations at Chinese-Owned Gold Mine in Rio Blanco on Halt”,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July 18, 2019.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 [2024-06-16]

④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矿业的活动：以米拉多和圣卡洛斯—帕那萨采矿项目为例》，2018 年 1 月。<https://media.business-humanrights.org/media/documents/files/documents>. [2024-06-16]

⑤ Amazon Watch, “The Risks of Investing in Solaris Resources”, March 2023. <https://amazonwatch.org/assets/files/2023-solaris-risk-assessment.pdf>. [2024-06-16]

（二）秘鲁社区干扰对中国矿业投资的影响

秘鲁矿业资源丰富，而中国在该国的资源投资同样遭受了严重的社区干扰。秘鲁曾长期以农牧业为支柱产业，进入工业时代后以铜、金等矿产品为主的矿业取代了农牧业的地位。^① 中国与秘鲁自建交以来政治与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当前中国是秘鲁能源与基础设施的第一大投资国。中国在 2005—2023 年间对秘鲁的资源投资存量为 282.6 亿美元，投资金额在拉美国家中仅次于巴西而位列第二。^② 然而，秘鲁国内对环境保护的过度强调，以及在劳工权利保护、限制外籍劳工输入、雇佣当地人条款等方面的苛刻条件增加了中国对秘鲁资源投资的风险。^③

秘鲁的拉斯邦巴斯铜矿因社区干扰而经历投产推迟、项目变更以及出口损失等诸多问题。该项目由中国五矿集团斥资 74 亿美元买下瑞士嘉能可公司运营项目的 62.5% 股份后所成立的五矿资源有限公司负责实施。项目坐落于秘鲁南部安第斯山脉的阿普里马克大区（Apurimac），铜矿面积达 3.5 万公顷且预计铜年产量可达 45 万吨，原计划于 2015 年正式投产。然而，社区干扰导致该项目被推迟。^④ 同样，该项目面临的社区干扰并非只针对中国投资，实际上自 2004 年该项目落地以来运营方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就持续不断。2015 年中国企业接手之后，项目矿区曾爆发多达 15000 人参与的反对矿产开发运动，而五矿资源有限公司也被要求修改环保计划并招聘更多当地雇员。^⑤ 当 2016 年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在付出 100 亿美元的巨额成本后开始采矿时，针对项目的抗议示威运动迅速兴起并持续了超过 600 天，严重阻断了矿区的开发与铜矿运抵中国。^⑥ 仅 2017 年 1 月，项目所在区域就发生了至少 13 起与社会问题及环境问题有关的冲突。^⑦ 2020 年年底爆发的为期三周的路障抗议又耽误了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秘鲁（2023）》，2024 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bilu.pdf.[2024-06-03]

②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2024-06-01]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秘鲁（2023）》，2024 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bilu.pdf.[2024-06-03]

④ 李紫莹等著：《中国投资拉丁美洲的风险与对策研究》，北京：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89 页。

⑤ 《中国矿企在秘鲁的麻烦有多大：多次因冲突被迫停产》，中国矿业网，2015 年 10 月 8 日。http://www.chinamining.org.cn.[2024-06-16]

⑥ Marcelo Rochabrun, “Chinese-Owned Mine Hit by More Delays in Key Peru Copper Expansion Project”, July 13, 2023. https://www.mining.com/web.[2024-06-16]

⑦ 路易斯·梅伦德斯·格雷罗：《中国在秘鲁的矿业投资：冲突、制度和地方发展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66—68 页。

价值5.3亿美元的18.9万吨铜精矿出口。可以说，秘鲁矿业所在地一系列的社区干扰行为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为中国资源供应增添了额外的安全风险。^①

首钢集团在秘鲁的铁矿投资同样受社区干扰风险的影响。首钢集团于1992年以3.11亿美元购买了秘鲁铁矿公司（Hierro）的股份并成立了首个进入秘鲁的中国矿业公司，即首钢秘铁股份有限公司。该项目矿区位于距秘鲁首都利马东南520公里的伊卡大区纳斯卡省的马尔科纳市。^②在随后的20年里，秘鲁政府不仅以项目违反当地环保法规为由对首钢收取了4次高额罚款，还曾宣布矿区所在地进入“环境紧急状态”以表抗议。^③除环境问题以外，受秘鲁宪法保护且频繁出现的集体谈判和罢工也给首钢带来了巨大损失。如2006年6月为期8天的加薪罢工给首钢造成了400万美元的损失，2009年的集体谈判高达68次，而工会组织的非法罢工就达4次。^④不难发现，以环境问题以及劳资纠纷为主的社区干扰是首钢在秘鲁铁矿项目顺利运营的两大障碍。

拉斯邦巴斯铜矿和首钢秘铁案例进一步表明在秘鲁的外国投资面临较高的社区干扰风险。除上述案例以外，中国铝业于秘鲁中部的特罗莫克铜矿（Toromocho）同样因环境纠纷等问题而进展缓慢，该公司还曾因该矿区居民的搬迁问题被索要3亿美元的天价安家费。^⑤总之，中国在秘鲁所投资项目的开展常常受制于劳工纠纷或苛刻的环保实践，甚至还因此面临大额且不合理的索赔。

中国在上述两国的资源投资受阻案例主要集中于采矿业，油气行业的相关项目也因面临类似风险而遭受直接损失。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曾因雨林暴雨导致的含油泥浆池外溢而遭到厄瓜多尔天价索赔；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厄瓜多尔共同成立的安第斯石油公司也面临瓦拉尼土著人（Waorani）等原住民的环境诉讼。这些原住民就开采过程中伴生的天然气导致空气污染而提

① 《中国五矿秘鲁 Las Bambas 矿将于 18 日停止铜生产》，铁合金在线，2021 年 12 月 23 日。
https://www.cnfeol.com/news/internal_summary/20211223/100051350155.aspx. [2024-06-16]

② 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有限公司：《首钢秘铁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zs.com.cn/ssgj_ywbk/ssgj_mltk/cindex1.html. [2024-06-16]

③ Lucien O. Chauvin, “Hierro Peru: China’s Footprint in the Andes”, December 1, 2006. <https://dialogue.earth/zh/1/37184/>. [2024-06-16]

④ 郭洁：《首钢秘铁矿项目的历史与变迁》，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第63-68页。

⑤ 《中国矿企在秘鲁的麻烦有多大：多次因冲突被迫停产》，中国矿业网，2015年10月8日。
<http://www.chinamining.org.cn>. [2024-06-16]

出诉讼，而2023年的全民公投也反对安第斯石油公司在项目所在区域进行石油钻探。^① 秘鲁抗议者还曾因为社区问题袭击过在当地的阿根廷石油公司（Pluspetrol）。截至2015年，秘鲁已经发生了200多起大规模社区冲突，其中85%的冲突与能源和采矿项目有关。^② 总之，以厄瓜多尔和秘鲁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潜藏着不容忽视的社区干扰风险。这些干扰虽然在烈度上不如国有化、内战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其对中国资源投资安全的破坏性同样巨大。

四 外国干预与中国资源类投资安全

第三国针对东道国的干预是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面临的又一大安全风险。下文基于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制裁以及圭亚那与委内瑞拉因石油勘探而再起的领土纠纷这两个案例，分析中国在拉美国家的资源投资所面临的外国干预风险。

（一）美国制裁委内瑞拉对中国石油投资的影响

委内瑞拉石油资源丰富但投资风险较大。石油占委内瑞拉商品出口的比重常年在95%以上并为该国带来了巨额出口收益。^③ 然而该国石油业因内部维护管理不善以及外部制裁等原因，政府需要为成品油的进口与消费投入巨额财政补贴。^④ 当前，中国占委内瑞拉能源与基础设施第一大投资国的位置。中国在2005—2023年间累计对委内瑞拉进行了119.1亿美元的资源投资，在拉美国家之中位列第六。^⑤ 然而，2018年以来中国对委内瑞拉直接投资的存

①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海外项目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简报》，2021年5月11日。<https://webadmin.wwfchina.org/storage/files>. [2024-06-16]

② Lisa Viscidi and Jason Fargo, “Local Conflicts and Natural Resources: A Balancing Act for Latin American Governments”, *The Dialogue Leadership for the Americas*, May 2015. <https://www.thedialogu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5>. [2024-06-15]

③ 宋亦明、邹仪婷：《委内瑞拉能源经济的增长何以不彰？——基于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产权制度的分析视角》，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6-130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委内瑞拉（2023）》，2024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weineiruila.pdf>. [2024-06-03]；Moises Rendon and Sarah Baumunk, “When Investment Hurts: Chinese Influence in Venezuel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3,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en-investment-hurts-chinese-influence-venezuela>. [2024-06-03]；Antonella Mori and Loris Zanatta, “Latin America at a Crossroads”, *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2017. <https://www.ispionline.it/sites/default/files/publicazioni>. [2024-06-03]

⑤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2024-06-01]

量逐年递减，仅 2022 年就同比减少 20.3%。^① 委内瑞拉目前被视为营商风险较高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对中国企业在委内瑞拉的市场开拓和经营合作等都造成诸多障碍。^②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施加了严苛的制裁，导致该国的石油产量与支付能力大幅下降。2017 年美国第 13808 号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或在美境内从事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有关的一切交易，2018 年的一系列行政命令进一步收紧了美国与委内瑞拉的金融往来。^③ 2019 年，美国冻结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子公司希戈石油公司在美境内约 70 亿美元的资产。^④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石油产量在制裁前为每日约 130 万桶，而到 2019 年下半年则降至每日 80 万桶，净现金流下降了近 100 亿美元。^⑤ 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以重油为主，其提炼高度依赖于重油稀释剂。然而，目前豁免于制裁令而向委内瑞拉提供稀释剂的公司为美国的油服巨头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和雪弗龙公司（Chevron）。^⑥ 可以说美国政府和哈利伯顿等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命脉。总之，这套以成品油禁运、封锁国际银行账户和终止境外金融交易等为代表的制裁组合拳严重削弱了委内瑞拉境内的石油开采与营收能力。

美国制裁不仅针对委内瑞拉，还针对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公司和向其提供帮助的外国实体，所以中国对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也难以隔绝制裁的影响。^⑦ 2019 年美国第 13884 号行政命令规定，对委内瑞拉政府及其下设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编：《2022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3 年，第 58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委内瑞拉（2023）》，2024 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weineiruila.pdf. [2024-06-03]

③ The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Venezuela – Related Sanctions”. https://ofac.treasury.gov/sanctions-programs-and-country-information. [2024-06-16]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委内瑞拉（2023）》，2024 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weineiruila.pdf. [2024-06-03]

⑤ Francisco J. Monaldi, et al., “What Does Maduro’s ‘Energy Emergency’ Mean for Venezuela?”, 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 March 5, 2020. https://www.thedialogue.org/analysis/what-does-maduros-energy-emergency-mean-for-venezuela/. [2024-06-03]

⑥ Frank A. Verrastro, et al., “Oil Sanctions and Venezuel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4, 2017. https://www.csis.org/analysis/oil-sanctions-and-venezuela. [2024-06-17]; Lisa Viscidi and Nate Graham, “Reviving Venezuela’s Oil Sector: The Role of Western Oil Majors”, The Dialogue, January 2020. https://www.thedialogu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1. [2024-06-17]

⑦ Anna Ramdass, “Drug Trade Keeps Maduro in Power”, Trinidad Express, June 4, 2020. https://trinidadexpress-tto-app.newsmemory.com/?publink=2ddfded9. [2024-06-06]

构和企业实施全面交易禁令和资产冻结，并禁止外国实体对其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① 受此影响，委内瑞拉不仅石油产量下降，而且很难为其石油找到国际买家，用于开发石油的贷款也难以偿还。中国公司在委内瑞拉投资的项目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此外，美国对在委内瑞拉的相关投资进行了严格审查，中国在该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遭受了美国的严苛审查。譬如，中国公司为避免被美国制裁，不仅并未给委内瑞拉供应由哈利伯顿公司和雪佛龙公司提供的重油稀释剂，而且还被迫面对委内瑞拉石油减产和随之而来的贷款偿付延期、投资收益降低等困难。^②

（二）委内瑞拉干预圭亚那领土对中国石油投资的影响

资源产业是圭亚那除林业和种植业外的又一支柱产业。^③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圭亚那资源与基础设施的第一大投资国。2005—2023 年间，中国在圭亚那资源投资的存量为 60.5 亿美元，投资金额在拉美国家中排名第七^④，投资领域涉及油气、铝矾土等多个领域并承建了该国近年来多个重大的资源基础设施项目。^⑤ 由于圭亚那资源禀赋丰裕，中国企业不断增加了对该国的石油投资。然而，近年来圭亚那与其邻国委内瑞拉在石油开发区的争端与冲突也给中国带来额外的投资风险。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参与了圭亚那第一批油田开发。然而，油田区域位于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存在领土争议的近海地区埃塞奎博。埃塞奎博地区内的斯塔布鲁克区块（Stabroek）是圭亚那目前唯一处于生产阶段的石油区块，美国埃克森美孚、美国赫斯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以 45%、30% 和 25% 的股份共同开发该区块。评估显示，开发该区块在 2020 年带来的收入占当年圭亚那全部出口收入的 39%，预计到 2025 年可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委内瑞拉（2023）》，2024 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weineiruila.pdf>. [2024-06-03]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委内瑞拉（2023）》，2024 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weineiruila.pdf>. [2024-06-03]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圭亚那（2021）》，2022 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guiyana.pdf>. [2024-06-03]；Dánica Coto, “Oil Boom Transforms Guyana, Prompting a Scramble for Spoils”,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6,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 [2024-06-15]

^④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2024-06-01]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圭亚那（2021）》，2022 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guiyana.pdf>. [2024-06-03]

为该国每年贡献超过 10 亿美元的油气收入。^① 截至 2024 年 2 月，斯塔布鲁克区块的利萨常规油田（Liza）一期已采收其总可采储量的 24.93%，预计该油田生产将持续到 2050 年才达到极限，而仅该油田就占到了圭亚那石油日产量的 30%。^②

尽管埃塞奎博地区由圭亚那实际控制，但该区域自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划界纠纷也因 2015 年的油气发现而加剧。^③ 委内瑞拉对埃塞奎博地区主权声索的兴趣日益浓厚，两国之间的边界冲突重燃给中国公司在斯塔布鲁克区块的投资带来了额外的风险。委内瑞拉政府坚称长期以来对这片土地拥有主权，圭亚那无权在埃塞奎博附近海域授予特许权。^④ 2018 年圭亚那因与委内瑞拉就 1899 年和 1966 年的边界裁决矛盾诉诸联合国最高法院。^⑤ 2023 年委内瑞拉政府举行全民公投，投票赞成委内瑞拉有权吞并埃塞奎博地区。圭亚那谴责委内瑞拉签署批准吞并争议地区的公投法律，向国际社会昭告委内瑞拉的吞并意图会给该国带来生存威胁。^⑥

委内瑞拉还就两国争端地区开展了系列行动，这些行动使中国在圭亚那的石油投资面临着风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称要在当地建立一个新国家并更名为“圭亚那埃塞奎巴”（Guayana Esequiba）。马杜罗签署了一项总统令，要求成立“圭亚那埃塞奎巴国防高级委员会”以负责资源勘探许可证的审批。这项命令还要求立法者制定一项法律，禁止任何曾与圭亚那在有争议水域开展业务的公司参与斯塔布鲁克区块石油的开采，并要求目前在该地区运营的石油公司于三个月内撤离。该命令还要求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一个针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圭亚那（2021）》，2022 年。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guyana.pdf. [2024-06-03]

② Offshore Technology, “Oil and Gas Field Profile: Liza Phase 1 Conventional Oil Field, Guyana”, February 19, 2024. https://www.offshore-technology.com/marketdata. [2024-06-17]

③ Dánica Coto, “Oil Boom Transforms Guyana, Prompting a Scramble for Spoils”,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6,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 [2024-06-15]

④ Mike Corder, “Guyana Tells UN Court that Venezuelan Referendum on Territorial Dispute I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he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14,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 [2024-06-15]

⑤ Bert Wilkinson, “Guyana Condemns Venezuela for Signing into Law a Referendum Approving Annexation of Disputed Region”, The Associated Press, April 5,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 [2024-06-15]

⑥ Osmary Hernández, et al., “Venezuela’s President Orders Creation of New State and Map including Land from Guyana”, CNN World, December 6,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12/06/americas. [2024-06-15]; Smruthi Nadig, “Explainer: The Venezuela and Guyana Oil Dispute”, Offshore Technology, February 29, 2024. https://www.offshore-technology.com/features. [2024-06-17]

对该区域的特别部门来管理即将开始的开发活动。^① 尽管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已于 2023 年签署了《阿盖尔宣言》，两国同意互相不威胁使用武力以避免紧张局势，但两国仍在争议地区附近兴建军事设施和提高战备等级。这意味着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在埃塞奎博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并未彻底消弥。^②

由于委内瑞拉和圭亚那之间的领土纠纷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中国公司在埃塞奎博地区的投资也将长期处在风险之中。除两国自殖民时期遗留的领土纠纷之外，考虑到石油资源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两国冲突的烈度从长期来看很有可能不断升高。就委内瑞拉而言，该国已经形成了对石油产业的单一依赖结构，很难完全放弃对石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埃塞奎博地区。就圭亚那而言，该国实际控制了埃塞奎博地区，并借助该区域石油财富成为 2019 年疫情下加勒比地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考虑到埃塞奎博地区占圭亚那领土面积的 2/3，加之巨额的财富收益，埃塞奎博地区也成为圭亚那不能割舍的核心利益。因此，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因涉及双方的根本利益而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彻底解决，在该地区的外国投资也难免受制于两国之间的领土纷争，不得不面对不断增长的投资安全风险。总之，上述两个案例表明针对东道国的外国干预会增加中国在拉美国家的资源投资风险。

五 结论

中国对拉美国家资源产业的投资固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项目落地后所面临的安全风险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所面临的安全风险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其安全风险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中国在特定国家的资源类投资存量规模以及该国自身的风险情况。初步测算发现，中国在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的资源类投资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在墨西哥等另外 4 个国家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

^① Osmar Hernández, et al., “Venezuela’s President Orders Creation of New State and Map including Land from Guyana”, CNN World, December 6,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12/06/americas. \[2024-06-16\]](https://edition.cnn.com/2023/12/06/americas.2024-06-16)

^② Ryan C. Berg, et al., “The Essequibo Pressure Cooker: Runaway Nationalism and Maduro’s Compellence Strateg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14,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 \[2024-06-17\]](https://www.csis.org/analysis.2024-06-17); Christopher Hernandez – Roy, et al., “Miscalculation and Escalation over the Essequibo: New Insights into the Risks of Venezuela’s Compellence Strateg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9,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 \[2024-06-17\]](https://www.csis.org/analysis.2024-06-17)

在乌拉圭等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风险相对较低和可控。研究进一步发现，中国在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所面临的安全风险除了源自政府的低效、泛滥的腐败、国有化的传统外，还主要源于由环境保护、劳工保障和居民安置等方面问题激发的社区干扰以及来自域外大国及邻国的第三方干预。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圭亚那等国家资源投资面临风险甚至遭受损失的案例，进一步佐证了社区干扰和外国干预现已成为中国在拉美资源领域投资中不容忽视的风险。

基于此，本文相较于同类研究可能在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其一，以“拉美国家”而非整个“拉美地区”为分析单元，提供了关于拉美国家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的可操作性测量。这一测量虽然粗糙，但仍可以满足关于安全风险的定类和定序分析。其二，超越了对海外安全风险面面俱到的罗列，将安全风险的描述性分析拓展至归因性考察。其三，在知识生产上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干扰和外国干预给中国在拉美资源类投资带来的风险，并且有助于加深关于国有化、腐败控制、政府效能、否决者数量等其他因素风险性的认知。

然而，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一方面，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所依托的数据构型简单，远不足以提供时效性好、感知性强、具有预测力的海外安全风险分析。实际上，海外安全研究要么依托于对对象国国内情况的长期追踪和对突发事件的感知研判，要么立足于诸如“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等海量事件的快速感知数据库进行安全风险追踪和预警。^①相比之下，本文所借助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数据不仅无法展现投资安全风险的时间变化，更难以做到时效性、感知性、预测性分析。另一方面，本文对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秘鲁等国家资源类投资风险的分析并未遵循案例选择和过程追踪的实证标准。这意味着本文的案例研究仍然粗糙，不仅存在过度简化的风险，也不足以反映社区干扰和外国干预这两个因素的负面效应。以上问题及不足之处有赖于后续研究加以弥补或修正。

除了对资源类投资安全风险的讨论外，中国对拉美国家的海外安全研究仍具有广泛的议程空间。例如，在研究对象上可关注中国在拉美国家建设和

^① The GDELT Project, “Raw Data Files”. <https://www.gdeltproject.org/data.html#rawdatafiles>. [2024-06-08]。除了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外，综合冲突早期预警系统、计算事件数据系统、政治动荡预测项目组等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参见漆海霞：《大数据与国际关系研究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60-163页。

运营的各类基础设施的安全。预计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比2015年增长67%，达到3.8万亿美元规模，其中交通和资源基础设施占比近七成，而届时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可能高达1.5万亿美元。^①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未来很可能在中拉合作中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相关的安全风险尤其值得进一步探讨。再如，在知识生产上可注重“耐心资本”在应对海外安全风险上的特质。“耐心资本”被认为是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特质，相关分析也有助于弥补“己学”范畴内关于海外安全风险研究相对单薄的现状。^②另外，在风险识别上可重新思考国有化对资产安全的潜在影响。尽管拉美国家具有深厚的国有化传统，但近年来国有化的机会成本以及对国家声誉的破坏性明显提高，以至于出现了国有化“雷声大雨点小”的转向。^③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两次国有化浪潮，当前拉美国家的国有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其对海外资产安全影响的新变化也亟待揭示。最后，在实证方法上可运用空间计量“打开国家的领土边界”，探讨中国在拉美国家具体投资项目对周边市镇或村落的影响及其对项目安全的负面效应。总之，关于拉美国家海外安全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 “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 Forecast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Needs and Gaps”, February 22, 2022. <https://outlook.gihub.org/>. [2024-06-08]

^② Stephen B. Kaplan, *Globalizing Patient Capit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nance in the Americ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陈兆源:《时间范围与国际投资合作中的耐心资本》,载《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1辑,第46-51页。

^③ 笔者分别于2024年5月14日和15日对安雨康和王飞进行了学术访谈,他们都对此重点提及。